

刘 禾著

# 帝国的话语 政治

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  
世界秩序的形成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 帝国的话语 政治

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刘禾著

杨立华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 刘禾著；杨立华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8

ISBN 978-7-108-03249-2

I. 帝… II. ①刘…②杨… III. ①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中国、西方国家—近代②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世界—现代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7141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7-206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75  
字 数 310 千字  
印 数 0,001 - 7,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 英文版致谢

在本书多年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我曾经得到许多同事、朋友和世界各地的学者的帮助，特在此致谢。首先要感谢 Patrick Hanan，他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我分享，使我获益匪浅。我还要特别感谢 Andrew Jones，他在 1994 年担任我的研究助理的时候，曾经帮助我处理了大量的全美圣经协会档案的微缩胶片（该材料原件已销毁）。由于年代久远，微缩胶片上的字迹印得模糊不清，Andrew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辨认和阅读这些段落，并写下详细的记录。本书第五章的部分档案工作正是他与我的共同努力的成果，希望这一努力被证明是值得的。本书的早期构思还受益于 Haun Saussy 的批评和建议，而他本人发表的有关 William Dwight Whitney 的文章，曾经启发了我在第六章里的研究。还必须提一下的是，我曾在柏克利加州大学执教多年，和那里的同事和博士生有过长时间的学术切磋，他们的慷慨支持对我来说，一直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这些学者包括 Paul Rabinow, Victoria Kahn, Ralph Hexter, Caren Kaplan, Chris Berry, Aihwa Ong, Alan Tansman, Stephen West, Jeffrey Riegel, Peter Zinoman, Larissa Heinrich, 以及近年去世的 Frederic Wakeman, Jr.。此外，我的研究还得到了以下研究助理和学者的大量帮助，他们的名字是 Jami Proctor - Xu, Carolyn Fitzgerald, Mark Miller, Petrus Liu 和杨立华。

在本书成形的各个不同阶段中，我与以下学者有过联系和交流，并且从不同的方面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或启发：Pamela Crossley, Alexander Woodside, Benjamin Elman, Jonathan Spence,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Paul Cohen, James Hevia, 李欧梵, Theodore Hutters, Martin Powers, Murray A. Rubinstein, Peter Bol, Emily Apter, Roger Hart, Paula Versano, Reyes Lazaro, 汪晖, 商伟, 陈燕谷, Mark Elliott, Lisa Rofel, 史书美, 赵刚, 崔之元, Dilip Basu, Wilt Idema, 邹羽, Barbara Fuchs, Tamara Chin, Jody Blanco, 以及我的英文书稿的两位匿名评审员。其他学者如 Yopie Prins, Madhav Deshpande, William Baxter, Robert Sharf, James Lee, Miranda Brown, 姜靖, 任海, Paul Strohm, David Porter, 和 James Porter, 无论是在日常交谈中, 还是以其他的方式, 也都向我提供了相关的研究信息和帮助。我尤其要向 Adrienne Munich 表示感谢, 她将自己保留的一幅表现维多利亚女王接见缅甸使者的 1872 年的版画图片寄给我, 当作本书的插图。90 年代我在英国和中国的几次访学期间, 得到了当地学者和朋友们的大力协助和关照, 他们是 Michel Hocks, 赵毅衡, Bonnie McDougall, J. P. McDermott, 王小明, 倪文尖, 罗岗, 鲍昆, 徐葆耕, 王中忱, 罗钢, 刘东, 王跃飞和刘嫣。

本书即将完成之际, 我正好开始在密歇根大学执教。密歇根大学不仅为我提供了研休时间, 使本书得以完稿, 而且还提供了很多机会, 使我能够就书中的个别章节与同事进行讨论。我十分感谢 Donald Lopez, Tobin Siebers, 林顺夫, 以及密歇根大学的其他同事和博士生对我这一研究的理解和支持。本书从开始构思, 到研究和写作的完成, 足足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 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人文部主编 Lindsay Waters 对我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耐心, 让我十分感激。本书的责任编辑是 Amanda Heller, 她对书稿的认真编辑, 以及哈佛大学其他编辑的多方努力, 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需要说明一下, 第五章和“结语”的部分章节, 曾以文章的形式在美国的理论刊物 *Diacritics* 上发表过。这篇文章当时是应邀参加 Pheng Cheah 和 Jonathan Culler 合编的有关 Benedict Anderson 新著的专辑, 两位特约主编对文章的构思曾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本书第四章较早的版本, 也曾收入由我自己主编的一部英文的学术论文集, 文集

的标题为 *Tokens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 由 Duke University Press 于 1999 年出版。在此, 我还必须感谢 Duke University Press 和 *Diacritics* 刊物所在的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他们慷慨地允许我在书中重印两篇文章里的部分内容。

本书各章的内容还以论文形式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进行过广泛的交流。我应邀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作 2002 年度的 Renato Poggioli Memorial Lecture 讲座时, 讲稿的内容主要来自第二章。当时 Patrick Hanan, Susan Suleiman, James Engell, Stephen Owen, Marc Shell, 和 Jan Ziolkowski 都给予我热情的支持, 并提出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除此之外, 我还要感谢以下研究单位和学院对我的热情邀请: 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 康奈尔大学, 芝加哥大学, 洛杉矶加州大学, 杜克大学, 史密斯学院, 哥廷根大学, 伦敦大学, 亚利桑那大学, 拉特哥斯大学, 伯令格林州立大学, 柏克利加州大学, 以及密歇根大学。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中国、欧洲和北美学者的热心帮助。1997 年度的古根海姆大奖 (Guggenheim Fellowship), 以及全美人文研究所给我的年度奖金 (Lilly Fellowship), 使我有了一年完整的时间 (1997 - 1998) 远离教学和行政事务, 全力投入本书的研究, 从而加速了写作进程。我在地处北卡州三角园的全美人文研究所度过的一年中, 取得很大的收获。那里的学术气氛浓厚, 使我有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出色学者学习和交流, 特别是 Mary Campbell, Elizabeth Helsinger, Dyan Elliott, Michele Longino。全美人文研究所的行政人员如 Kent Mullikin 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都予以大力的支持。本书的研究还得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秦国经先生的热心帮助, 以及故宫博物院的朱家潜先生的支持。此外, 还有以下部门对我的帮助, 在此一并致谢: 全美圣经协会图书馆档案部、美国长老会协会档案部、美国国家档案和文献局 (NARA)、伦敦大学东非学院的图书馆 (SOAS)、剑桥大学图书馆、英国国家公共档案馆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大英图书馆的印度分馆 (The Indian Office of the British Library)、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

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柏克利加州大学图书馆以及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等。本书的写作始于柏克利加州大学，结束于密歇根大学。我非常感谢这两个我曾经任职其中的学术机构，为我提供了休假时间和多种资源，使得此项研究终于得以成书。

本书是献给李陀的。对于我来说，李陀是最富于洞见和直言不讳的批评家，是他和一些朋友，让我有可能和国内最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站在一起，为新国际主义的理想而共同奋斗。

## 导言 是帝国的碰撞，还是文明的冲突？

语言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

——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卡斯蒂利亚语语法》（1492）

1997年的夏天，我恰值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和英国的国家公共档案馆进行文档研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我初达之时，正值香港历史性地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夜，倒计时之钟正在滴答声里分消秒逝。查尔斯王子为即将要举行的交接仪式做着最后的准备，被各家报纸逐日逐时地报告给公众。报纸的版面上还登着各式各样的评论文章，争先恐后地预料香港的未来。每天早晨，我先浏览一遍报纸的头版标题，然后坐上开往邱园站的那一列地铁，继续我在公共档案馆的研究。在那里，几乎每天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埋头阅读鸦片战争期间大英帝国与清政府之间的外交公文。令人感慨的是，当年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正是以鸦片战争和一连串与大英帝国的军事冲突为发端的。

英属殖民地香港在1997年夏天即将回归中国这件事，使我的注意力重新投向帝国和主权的论题。足足有一个多世纪，这一话题始终困扰着中英关系和中外关系。香港回归是一次机缘，并直接影响了我的研究计划，因为本来我是准备花些力气研究19世纪传教活动中的《圣经》翻译。但是，我当时接触到的原始材料，也包括了150年前决定了香港命运的帝国战争的官方文件。身在英国，差不多每天都和这些文件肌肤相触，同时又亲眼见证香港回归中国的那一瞬间——这一奇



特的时空巧合不能不让我琢磨其中深意，也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计划的大框架。当时最触动我的是，由于涉及到历史上英国和中国对于香港的主权，各国媒体中不断出现了对于“交接”、“接收”或者“回归”等字眼的争议。虽然事在当代，我听到的却是一系列更老旧的关注和焦虑在 20 世纪末的再一次回响。在英国的国家公共档案馆，我所翻阅的官方外交文献中，就有大量的有关尊严和名分的争吵，其中对汉语和英文词语的确切用法，各方尤其纠缠不休。甚至可以说，在 19 世纪鸦片战争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双方的这一类争吵经常喧宾夺主，淹没了有关鸦片贸易问题的论辩。对于发动鸦片战争的统治者来说，使用什么样的话语和如何翻译词语，往往成为帝国意志较量的中心场所，而不简单是条约谈判中偶尔发生的文字上的擦枪走火。

我自己的本行虽然是文学理论，但我对档案文献、历史文本，和各种（包括文学在内的）人工创作等材料，始终保持强烈的兴趣。原因在于，我认为理论的创造应落实在历史文献和具体文本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触摸到理论的根基以及——假如容许我这么说——理论的精髓。概括来说，本书致力于研究 19 世纪以来围绕主权想象的跨文化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我所发掘的话语历史，涉及到道德和情感介入现代主权想象的方式，其核心问题是：所有这一切，对于现代世界中的帝国和民族国家如何产生有效的意义？由于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符号和意义始终在不断地环游、流通和迁转，因此，一本研究近代全球化历史的书，也必须密切地关注文本、器物 and 理论话语是如何地环游、流通和迁转的。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这些事物往往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和规模跨越了众多语种、民族、文化以及文明的疆域。

本书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着重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还有视觉文本中的话语政治。在这项研究中，我不得不处理大量的不同种类的文本和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国际法、符号学、帝国之间的礼物交换、传教士的翻译、语法书，甚至还有殖民摄影术。所有这些内容，是由一条贯穿本书的主线统一起来的，这条主线就是与欲望和主

权想象有关的帝国的话语政治。我在着手本书写作之初，没有料想到如此庞杂的研究线索竟然能够统一在一本书的论述之中。

在这里，我要特别申明的是，帝国之间的碰撞，不可轻易混淆为文明的冲突。说到底，文明之间无所谓冲突可言，而历史上的大规模冲突都是在帝国之间发生的。书中第一章提出的是解读现代帝国的方法。基于我对 19 世纪下半叶的符号学理论和帝国军事中的电讯通讯技术的共生性发展的研究，本章重点处理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我认为，如果要想读懂现代帝国，我们就必须将语言、战争、国际法、符号的技术发明以及异域性（foreignness）纳入同一历史进程加以思考。在我看来，以往的帝国史和殖民历史研究之局限在于，它过度沉湎于欧美自身的学术传统，因而时常忽略上述提到的那些技术上的和跨文化意义上的历史关联，结果，这些研究成果最终还是不得不复制或重申殖民过程中出现的那些主权概念。基于此，本章的论述为以后的各章提供了理论上的和历史上的坐标，针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符号的指涉性（indexicality），以及军事暴力等理论问题提出新的研究框架，并批判地反思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福柯（Michel Foucault）、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阿冈本（Giorgio Agamben）、法农（Frantz Fanon）、斯托勒（Ann Stoler）、派格登（Anthony Pagden）以及其他学者和理论家的相关论述。

第二章探讨的是“野蛮人”（barbarian）这个概念如何在大英帝国与大清国的军事冲突过程中，获得其极为特殊的跨文化和跨语言的定位。我在对中英《天津条约》和同期的官方档案资料和出版物的分析和比较当中，发现在鸦片战争前后，汉字“夷”的翻译有一个自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是跟英国人发明的“夷/i/barbarian”这个跨越单一语言（英语或汉语）的衍指符号（super-sign）密切相关。英国人坚持认为，该汉字的使用旨在蓄意侮辱外国人，因而特地提出《天津条约》第 51 款，废禁此字。由于这是一段特殊的国际法公案，我们不能在通常的字面翻译上，或在词典意义上继续纠缠汉字的“夷”跟英文词“barbarian”之间是否存在等义，而是要进一步追问，“等义”本身

是如何历史地浮现并被规约的？否则，就等于绕开了活生生的历史而进行空洞的文字游戏。因此，针对“夷”字的公案，本书提出了两个历史性的问题：其一，19世纪汉字“夷”的衍指符号，何以对欧美国际法和当时正在形成的帝国秩序构成严重的威胁？其二，针对这个汉字的禁忌，我们应如何探寻其心理焦虑的源头？

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夷”字在汉语本身的变迁和运用，则是第三章的重点。我们知道，在朝贡体系的历史叙述当中，在满族统治者的帝国意识形态当中，“夷”的概念非同小可。对比18世纪雍正皇帝发动的那场由曾静案引起的文字狱，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议题：虽然清朝的统治者对那些反抗其异族统治的持异见者严惩不殆，但是他们的做法与英国人很不相同，与其说满族统治者的抉择是禁用“夷”字，不如说他们赋予了这一儒家概念以新的地理政治的解读，用以拓展他们自己的帝国规划。清代公羊学的兴起就表明，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夷”这一概念所涵盖的，不单是对异族或外国人的命名（无论褒贬），更重要的是，它（在地理政治的意义上作为动词来对待似乎更加合适）实行的是界定、进而命名统治者的主权（而不仅仅是领土）边际，尤其是当这个主权边际——究竟谁是夷？——并非一成不变，比如日本人当时也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夷”这个概念来界定自己的主权边际。由此，我在本章提出，“夷”是儒家经典主权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而这个主权理论我们可在《春秋左传》，尤其是近两千年的经学注疏传统中，窥见一斑。

在第四章里，我对19世纪国际法的翻译和传播进行了详细论述，并着重分析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及其1864年的经典中文译本《万国公法》。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是《万国公法》的主要译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未末，他同时扮演了又是翻译官又是外交官的角色。我通过发掘档案资料、官方记载以及出版物，将这个人物凸显出来。丁韪良当时为恭亲王王事的大清国总理衙门服务，与此同时，他又效忠于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丁韪良将《万国公法》

翻译和出版，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 19 世纪大清国、西方列强、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外交关系正是经此事件而逐渐框定。通过分析《万国公法》中跨文化的认知方式，以及这一认知方式在帝国和帝国之间以及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如何流传和互动，我们可进一步加深对现代主权理念和国际法的理解。

由于性别对于 19 世纪的帝国统治不可忽视，我在第五章里，把焦点转向维多利亚女王和慈禧太后大致相同和漫长的统治时期，试图给帝国研究提供一个特殊的性别研究角度。值得注意的是，正在这段时间，西方传教士中的女性和海外华人中的男性，都各自频繁地游走于欧洲宗主国、殖民地和大清国之间，使得这些群体的政治归属和情感归属变得十分复杂，从而经常受制于她（他）们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对此，本章旨在发掘一种性别的解读方法，动态地考察 19 世纪的主权情结如何形成，并如何得到表达。无论是在女传教士和女教民之间的交往，还是帝国之间的礼物交换，抑或 19 世纪欧美妇女选举权运动背后的殖民地楷模，我们都可以看到主权情结从中起到的作用；比如 19 世纪维多利亚女王向英属非洲殖民地酋长赠送《圣经》的故事，还有英美女传教士于 1894 年慈禧的六十大寿庆典期间向她赠送《圣经》礼物的事件，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可以诠释的内在联系。针对这一类行为的复制和效仿，我提出的问题是，帝国的礼物交换和相关的礼仪，是通过怎样的渠道获得其特殊的符号意义的。在进行这项研究中，我发现，性别的符号不但对于 19 世纪的主权想象至关重要，而且它还必然获得跨文化的特征。不过，以此种方式去幻想自己与女君主的象征联系，不惟独西方的女传教士。马来西亚华裔辜鸿铭，本来是英国殖民地的属民，然而，他决定将慈禧太后称为大清国的“国母”，不但与之认同，并且移居到中国为大清国效劳。辜鸿铭对慈禧太后的忠诚，背后其实是他对于自己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殖民地属民这一身份的否定。我们通过研究辜鸿铭的主权情结，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性别与帝国以及殖民地属民的主体性的游动性，从中得到一些深刻的启发。

第六章着重探讨语言和语法学如何在 19 世纪被逐步地纳入主权想

象的范围，凸显出现代国际法与现代语法学之间的历史关联。本章通过对 19 世纪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著述的分析，试图表明国际成文法和比较语法学之间，曾经有过亲密的共生关系，这一共生关系贯穿了 19 世纪西方的主流语言学理论，帮助培养了以实证“比较”为方法的学术。如果说国际法在主权的问题上往往反映出帝国的意志，并由此来规范国际事务的话，那么现代语言学也曾经试图为全世界语言中的语法形态的演变实行分类和规范。由是，比较语法学这一学科应运而生，企图在语言实证的基础上建立有关种族、原始文化以及对主权的认知体系。但是，这里反映的是印欧语系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存在于印欧语系之外的非屈折语言，则由于没有“语法”或没有相应的语法而被贬为劣等语言。面对这种顽固的逻辑斯中心主义，研究非屈折语言的学者是如何回应的呢？本章的研究表明，当中国的第一位比较语法学家马建忠肩负起编写《马氏文通》（1898）这一艰巨任务时，他一方面借用属于印欧语系的拉丁语去喻说古汉语，另一方面则试图为古汉语争取自己的主权身份。也就是说，马建忠的初衷是要为汉语语法正名，但由于他的比较研究方法源自拉丁语法的参照系，回应的又是来自印欧语系的挑战，因而，这一汉语语法的名分不得不陷入困境。这一过程深刻揭示了 20 世纪汉语语法学的学科本身两难处境的历史渊源。

在本书结语的部分，我把各章里对主权想象的分析，最后延伸到对当前世界秩序的思考。自鸦片战争至今，帝国从未在世界舞台的中心退场，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帝国的话语政治一次又一次地粉墨登场呢？为了将这个问题具体化，本章详细考察清朝皇帝几件宝座的神秘行踪，以及它们与现代博物馆的关系，与摄影镜头的关系，与当代电影的关系。我认为，殖民记忆和视觉影像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殖民主义时代的话语政治不单单是过去的风景，它至今还缠绕着帝国的无意识，阴魂不散。

# 目 录

英文版致谢	1
导言 是帝国的碰撞， 还是文明的冲突？	1
第一章 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	1
帝国的符号指涉：A（·——）B（——···）	4
衍指符号（The Super-sign）：不同的语言如何被抛置一处？	10
主体间性的交流与恐吓	16
欲望与主宰者的主体	20
殖民暴力与现代主权概念的起源	27
第二章 衍指符号的诞生	38
一个奇特的法律禁令	39
谁是野蛮人？	44
“夷”字之辩：1832年	52
野蛮人的眼睛（The Barbarian Eye）	63
英国人的名誉	73
殖民统治的伤害话语	83

第三章 主权想象	98
夷：如何命名主权统治的边界	100
失去指涉对象的“支那”：Cīna、支那、China 等	104
雍正帝及其文字狱	115
大一统的帝王意识形态	121
驱除“夷”字的幽灵	131
鸦片战争与“外国鬼子”	135
第四章 翻译《万国公法》	146
互译性：殖民主义史学的盲区	148
丁韪良：集翻译家和外交官于一身的传教士	153
《万国公法》翻译的前后过程	163
普遍性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168
寻找公度性	176
第五章 性别与帝国	187
帝王之间的礼品交换：“新约献本”	190
维多利亚女王与慈禧太后	198
海外传教的楷模	207
三条纽带之间的政治情感	230
捍卫一国之母	238
第六章 语法的主权身份	249
印欧语系家族的理论假说	252
马建忠及其语法著作	265
在语法性之外	274

“字”与“verbum”之间的衍指符号	279
结语 围绕皇帝宝座的主权想象	287
殖民主义的影像技术	289
太和殿的宝座	298
主权想象的复写平面：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	305
附录一 林则徐等会奏《拟谕英吉利国王檄》及英译文对照	311
附录二 《公法新编》中西字目合璧（1903）	322
中文版后记	343



# 第一章 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

当代科技之“新”总是令我们在文化上措手不及，其实这一说法并非确论。很多背景性的假设与实践之“旧”还潜藏于这些个案的边缘，未能得到检验。这种遗忘同样也构成了科技的语境，并且框定了我们的问题与反应。

——保罗·拉比诺，《理性人类学论集》

一般说来，国家的概念撇开主权是无法想象的。不过，这一老生常谈究竟揭示了一些什么道理？它向我们秘而不宣的思想又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的疆域和族群身份仍然在不断地聚散分合，当代帝国也经常以民族国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为此，即使是负载普世价值的个人，如今企图要完全摆脱主权想象的阴影，恐怕也是困难重重。这一切，使得我们不能不进一步思考有关人的尊严的种种现代论述，这些论述本身有没有罩着一层主权想象的神秘面纱？我们还要问：人的尊严究竟是相对什么而言？尤其在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丧失主权往往意味着尊严的泯没？为什么尊严的复得往往意味着主权的重申？

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曾试图以“致命的生存心理症结”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此种心理症结完全可以追溯到那段充满暴力的殖民历史。他的观察充满了洞见。<sup>[1]</sup>法农的临床研究对象主要是殖民地的黑人团体，他发现在这些

---

[1]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页 12。